

新时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第23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张 骏

2020年9月25—27日,第23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本届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承办。来自全国近50家高校、科研机构及杂志、出版社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研讨会以“新时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为主题,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流派”及“中外史学交流”等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本届研讨会是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背景下举办的一次全国性史学理论盛会。为期三天的线下会议既考验了主办方和承办方筹备、组织会议的能力,也体现出国内相关学者对史学理论研究的关注与热情。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得以继续扮演好国内史学理论前沿研究平台的角色,并发挥挖掘、培养新一代史学理论人才的积极作用。

一、新时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第23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主题是“新时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各分议题和相关讨论均围绕其展开。所谓的“新”不仅体现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新材料、新问题的发现与提出,也体现在新视角、新方法的应用,指明了新时代史学理论发展的方向。这在大会的两场主题发言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吴英(历史理论研究所)指出,重构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提升唯物史观的解释力是新时代唯物史观研究的必然使命,而其问题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和历史学家在史学实践中运用这些原理时所产生的抵牾。社会形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存在决定意识是三个最急需澄清的理论要点,只有在重新调适哲学观点和史学研究的关系之后,唯物史观才能体现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张秋升(天津师范大学)考察了史料选择、史料体裁和史料义例这三个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的核心理念,并揭示了其背后与儒家历史功用观的联系。儒家思想规约了古代史书的政治史内容,并通过这一内容决定了史料的选择、体裁和义例。陈勇(上海师范大学)以时间为线索,详细梳理了傅斯年自大学求学阶段直到晚年对历史客观性问题的认识发展,指出蕴藏在其激烈主张下关于历史主客观对立的矛盾心态,从而解释了其史学实践中所体现的犹豫与反复。两位学者的发言均为老题新作,重构了历史编纂、史学客观性等核心理念的意义与内涵,为未来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徐松岩和何平两位学者分别从世界史书写的古今两端,借助新问题的提出及新视角的运用,表达了相关见解。徐松岩(西南大学)以“史实、史料与史学评价——读色诺芬《希腊史》《长征记》札

记”为题,通过对《希腊史》和《长征记》两部史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讨论了史料中的错愕之处,启迪学者应以怀疑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对待历史记述。何平(四川大学)介绍了国外“当代史”研究的热潮,强调当代史研究对于过去与当下的理解之重要性。当代史把最近的过去概念化,这一新兴观察历史的视角对于人们理解当下切身相关的问题——诸如全球化、传染病流行与预防等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在第二场主题发言中,发言的学者们则从各自关注的史学实践与理论问题出发,充分表达了史学理论的新观念和新进展在研究中的作用。粟品孝(四川大学)关注具有地方特色的巴蜀史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从代表人物、组织制度等不同层面阐述了四川从晚清到解放后史学的现代化进程。尤学工(华中师范大学)以“清初史家的忠义论”为题,着重分析了遗民史家和仕清史家之间的分野和互动,展现了遗民史家对于明清易代殉难死节评价的转变过程,点出清初人们的忠义观逐渐回归传统伦理纲常的趋向。廖久明(乐山师范学院)通过郭沫若致《历史研究》编辑部及致刘大年相关信件的年代考证,提出使用书信作为史料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可以说,新形式、新视角和新材料的观念分别在三位的报告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且有着突出表现。

梁民愫和王旭东分别谈到了新的理论方法的运用。梁民愫(上海师范大学)聚焦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发展中的“文化转向”,指明了E. P. 汤普森作为新一代左派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他有关工人阶级的“形成”、平民文化问题的构建等内容,彰显了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史观的鲜明特色。王旭东(世界历史研究所)对历史信息、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史学变革进行了原创性阐释,突出了信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处的核心位置和关键影响,它与科技进步相结合,共同改变了人类的认识媒介与认识结构。无论是英国新左派史学的文化转向,还是信息史学的蓬勃兴盛,都离不开反思这类史学理论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概念的应用,理论方法的更新在这些问题的考察中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学者开展中外历史研究的根本理论,依然是本届研讨会学者们讨论的重点。而从这一板块所提交的论文主题来看,具有兼容中西、史学实践与理论并重的特点,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念与内涵,拓宽了相关研究方法和思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代表人物处于相关讨论的中心。陈娇娇(天津师范大学)从历史哲学及史学理论构建的角度,审视了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与常乃惠《历史哲学论丛》两部经典著作。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主导性思想,而以常乃惠为代表的新历史哲学体系的创造性则为反思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历史构建提供了独到视角。何刚(乐山师范学院)结合不同时代的政治语境与学术语境,通过档案史料的解读,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实情节,使郭沫若任主编《中国史稿》等通史性著作中的思想面貌获得完整呈现。何宛昱(中国国家博物馆)关注1933—1934年陈翰笙在国内的实践,指出他自觉地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为核心概念完成了广东农村社会调查,而随之展开的关于学术调查方法的争论,正是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在学术潮流中积极争夺话语权的缩影。与此相应,李自强(山东大学)从陈翰笙与国际学术界交往互动的角度出发,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陈翰笙与列宁、考茨基、托尼、魏特夫

等思想家和学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除了上述这些经典代表人物的专题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同样是学者们讨论的中心问题,相关论文讨论的时间跨度贯穿了整个20世纪。张杰(中国国家博物馆)指出,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的关键前奏,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蔡和森及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中积极使用、推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将中国史学引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崭新领域。任虎(华东师范大学)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传播与接受为线索,分析其传入中国、发挥影响和形成著史框架模式的有机过程,证明其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对中共党史研究和史学著述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新中国史家汲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源泉。王兴(中国人民大学)考察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古史的建构历程,其中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指导和考古学材料的运用成为两大特色。它的运行模式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叙述为主轴,以考古发现为支撑。这些宝贵的经验与反思在建构新时代古史“三大体系”工程中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王慧颖(历史理论研究所)围绕自20世纪20年代迄今的奴隶社会问题争论展开论述,认为有奴隶社会、无奴隶社会及回避奴隶社会三派的观点均涉及先秦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争论带来了先秦时代社会结构认识的深化,从而完善中国古史的探索与研究。毛泽东史学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40年得到了充分关注,黄令坦(湖南大学)从史观转变、重要概念、理论贡献、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等不同维度对这段时期内的相关研究进行分类总结,对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发展脉络、交往互动及当代价值作出更进一步的探索。

在本届会议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题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问题的归纳与反思是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同样受到学者们的强烈关注。廉敏(历史理论研究所)从“历史理论”一词的源头出发,追踪了西方语境中的“历史理论”、传入近代中国的“历史理论”,以及当代中国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阐明了作为舶来品的“历史理论”在近代中西史学现代化、学科化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宁姗(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试图厘清宗教与哲学这两种人类意识形态在西方历史理论中的应用界限,并以神学家洛维特误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例,指出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诉求不能借助建立在基督教末世论之上的神意理论。初庆东(华中师范大学)详细介绍了莫里斯·多布从一名出身新古典经济学大本营的经济学家向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变的全过程,高度评价多布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史学讨论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指出其赓续了自斯密到马克思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传统,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施华辉(杭州师范大学)反思了佩里·安德森在英国左翼运动消沉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历史书写中突出“霸权”,并引入欧洲大陆革命思想,促进知识分子政治化的过程。由此,悲观的历史分析与乐观的未来预估成为佩里·安德森史学思想的两面,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长久的魅力。而在历史理论、宏大叙事受到后现代史学思潮碎片化、主观化倾向挑战的当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可资充当重构历史本体论方面实在性的利器。倪凯(聊城大学)即以思辨的历史哲学走向分析的、叙事的历史哲学的历程为背景,论证了当代史学理论所关注的主客体分离及由此而来的相对主义难题可由马克思“对象性活动”理论加以消解。上述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内容紧随时代潮流,与当下新时代史学体系建设密切相关,反映了当代相关历史和史学理论问题研究正在迈向全新的阶段,各种新观念、新方法的运用都将成为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探索的必要保障。

三、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

本届研讨会有关中国史学史部分的讨论横贯先秦至新中国的漫长历史,相关研究尤为集中在明清史学的编纂特征,以及晚清至今新史学的制度建设和现代化转型方面,新问题的提出以及新范式的应用正是这两大时间段史学变革的动力来源。学者们的讨论围绕着诸如古史编纂、史学方法、治史理论等主题展开,使得新时代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反思呈现纷繁有机的面貌。

朱露川(北京师范大学)对中国古代史书叙事传统进行了整体考量,从叙事的概念、“人”的作用、“事”的品格、叙事与议论、技艺与审美等五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归纳。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以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为切入点,揭示了“究天人之际”的全新意涵,那就是司马迁在黄老学说的指导下,重点记述天人之间的长时段互动。上述两文分别着力于传统史学的发端与品质,在运用观念与方法之处均有突破前人窠臼的新意。

明清史学的近代变革是多位学者共同关注的对象。传统王朝与社会所面临的新情势和新局面客观上需要当时的史学家做出时代所要求的应对,这些因素反映在史学编纂与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便造成了诸多复杂并具特色的现象。

常文相(历史理论研究所)检讨前人有关明代商人、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的研究取径,认为无论“资本主义萌芽”抑或“现代”社会转型说,作为传统中国现代化的解释模式仍然受限于参照欧洲经验的单一因素决定论及欧洲中心主义,而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有可能为此提供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框架。纪海龙(廊坊师范学院)在其关于《明实录》地方采纂的考论中,认为地方史料征集制度在国史编纂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推动了方志、家乘的编纂,而且使官方、民间史学形成了良性互动。吴海峰(西北大学)专注吴三桂乞师叙述的历史考察,梳理了复仇说、丧国说和降闯说等矛盾多元的历史书写流变,折射出吴三桂身份角色的变化在和明遗民、清朝官方关系的疏离中形成的不同影响。重修宋史是明清学林的一大学术话题,钱云(四川大学)详细回顾了这一牵涉众多文人、官员的史学热潮,从学术、政治与社会的多重脉络进行考察,指出重修《宋史》之所以能超越时代,正因为其反映了学风、时风,时刻关照前代不断争论的问题群。

李长银、高远、张建斌、蔡炯昊等学者的论文涉及史学方法与史学制度变迁背景下对清代史学编纂的反思,具有相当的理论批判性,为重新定位清代史学发展及其在传统中国史学历程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新的尝试。乾嘉正统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是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场史学范式变革,李长银(山东大学)分别对比了恢复孔子真相、《周易》《诗经》本原,以及诸子研究在这两场运动中的表现,彰显了乾嘉正统考据学在近代学术文化转型中的作用。高远(四川师范大学)以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关于野史征引态度与实践的偏差为线索,全面论述了赵翼开明的野史观和野史在正史论纂中的作用,总结其自相矛盾的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学风与个人观念的分离。档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起点与依据,能否正确运用直接关乎史学成果的品质,张建斌(历史理论研究所)介绍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端方档案的文本生成与流传整理的复杂过程,体现了其整体性、系统性与原始性的特点,强调史源学视野下的档案考察有利于档案的有效利用。蔡炯昊(四川大学)将清史馆编纂清史的过程放在辛亥革命之后政治立场、文化态度各异的群体博弈背景下进行观照,清遗民与革命党人对纂修清史的不同看法夹杂着当时众声喧哗的舆论,反映了情感、政治与学术之间史书编纂的命运。

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发展走向了一个理论多元化、制度规范化和学术专业化的时代,这些特点在晚清民国至新中国的史学变革中得到彰显。正是由于上述方面的创新,传统中国史学才能真正完成现代转型,其中的典型人物、代表组织和核心观念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尤以在现当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同时代学人为代表。卓立和张峰分别从人和杂志的角度,考察了傅斯年及其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对现代中国史学观念发展的影响。卓立(西南政法大学)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旨趣》为分析对象,结合观念史方法对其进行重新解释,认为傅斯年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是比较语言学,其本质是秉持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是观念史料观的体现。张峰(西北大学)详细梳理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作者群与论文情况,从中折射出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在现代转型期的状况,指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对传播史学知识、更新史学观念、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应当进行深入发掘和系统探讨。骆扬(陕西师范大学)通过《陈垣史源学杂文》中关于王鸣盛的批评,分析总结了陈垣重视目录学的史学方法以及治学穷本探源的怀疑精神,对史学工作者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谭星(历史理论研究所)以张荫麟作为现代史学转型时期的代表,描绘其历史哲学、史料观和历史编纂法的特征,勾勒其治史路径,为进一步探讨张氏史学与史学转型风潮之联系奠定基础。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通过对吕思勉中国史学史著述的归纳解读,总结其带着问题写史学史、抓住君权与史权博弈的主线和追求一家之言的三个主要特点,为吕思勉在中国史学学科史上的定位提供了全新论据。张德明(历史理论研究所)探讨了姚从吾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特别注意到他学贯中西、包容并蓄的学术背景对其史学方法相关课程教授的影响,《历史研究法》和《历史方法论》是最能体现这方面精神的两部著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认识论和相关历史认识媒介、方法的讨论日益凸显,有异于以往对人物、著作的单纯个案研究的取向。刘泽华作为国内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受到了学者的关注,王丁(南昌大学)认为刘氏关于五种形式历史认识的划分,初步建构了历史认识论的基本体系,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和批判意识的色彩。尹媛萍(历史理论研究所)从另一种现代化的视角,即传统史料的数字化,解释了史学家选择、排列和运用材料的所谓“构图”能力,这是一种伴随科学技术进步的史学认识革新过程。许立阳(安徽先兆电气安全检测与预警工程技术中心)阐述了如何把数据报告的编制视为一种史学实践,并对这一实践产生的理论自觉和衍生问题进行了反思。上述研究都反映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新问题域和未来可能走向的形态,值得和深思。

四、外国史学理论与流派

有关外国史学理论与流派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和国内学界对于外国相关史学理论及其著作译介的增长,中国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热度和水平均在相应提高。这从本届史学理论研讨会所提交的相关论文中得到印证,关注议题广、讨论深度大,兼具具体个案研究和流派趋势的关注,这些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下外国史学理论反思的面貌。

作为外国史学萌芽时期的先声,古希腊罗马与拜占庭时期的史学书写是学者们历来聚焦的热点。白春晓(武汉大学)以“修昔底德的焦虑”为题,探索了修昔底德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心路历程,指明修氏试图通过历史书写为个人辩解、为城邦吁叹以及为命运排遣的情感诉求,而这往往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因素。阿慧(复旦大学)讨论了约瑟夫斯在其《犹太战争》著作中塑造自身形象

的方式,从而帮助人们理解约瑟夫斯背后的意图,能够更全面地评价这部长久以来饱受争议的作品。吕厚量(世界历史研究所)梳理了二世纪雄辩家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的政治演说词,剖析了其中蕴含的当时知识精英的历史观和历史记忆的更迭。赵法欣(西南民族大学)揭示了11世纪拜占庭史学名著普塞洛斯《编年史》中令人迷惑的思想立场,指出其在浓厚的基督教神学观念之外,对古希腊罗马作家的模仿和古典知识的运用也是重要组成部分。陈悦(武汉大学)借用环境史的方法,从气候变化的角度重新理解拜占庭帝国“黄金时代”的社会经济变迁,认为十世纪寒潮对拜占庭帝国小农经济的打击是动摇帝国经济基础的关键因素。

近代外国史学在经历了专业化、学科化的重大转型后,关注的问题与观念均较之古典时期发生了转变,世界史、历史比较和历史认识批判的盎然兴起就是显著的标志。张一博(北京大学)指出,《萨尔普世史》是18世纪西方学者将吸取到的中国历史知识与经验纳入传统西方世界史写作框架的一次尝试,在后世产生了重大回响。姜静(郑州大学)以斯金纳重拾17世纪英国革命语境的方式,考察了帕克、哈林顿及弥尔顿等抵制斯图亚特王朝专制主义的思想源泉,并把这种新罗马自由主义与古罗马自由观念、当代主流自由观念进行了对比。柏悦(西北大学)关注新兰克学派在19、20世纪之交德国史学困境中兴起的原因和历程,点明这批历史学家的主张和德国在国际事务上寻求独立和扩张相适应,这是他们容易被忽视的一面。张骏(四川大学)从认识论角度评析了狄尔泰精神科学理论与史学变革的关联,并说明所谓“历史理性批判”并不意在回到过去康德式的道路,而是面向未来的一种全新尝试。

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国史学理论百花齐放,各类思潮先后占据了史学发展的舞台,本届研讨会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的探讨亦着墨甚多。李任之(清华大学)认为在20世纪30—60年代,英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有着一股从不信教到宗教热忱、从自由主义到新正统主义的潮流转移,对于历史中神意的肯定成了当时相关作品的显著特点。陈慧本(上海师范大学)聚焦托马斯·尼佩代三卷本《德意志史》,归纳了他自身对传统历史主义特征的总结,以及“新历史主义”的改进之策,并由此影响了“日常史”等新兴史学流派的发展。尉佩云(山西大学)将约恩·吕森的史学思想与德罗伊森的相关理论建立关联,指出吕森合理地扬弃了德罗伊森有关历史意义、历史知识性质、历史教育等方面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并把合理的部分转化为现代史学理论话语加以弘扬。李恒(河南大学)着力分析安克斯密特历史经验的内涵,指出其经验理论意指那些无法被语言、文字等中介所表现的经验,经验理论也就超越了表现理论,成为安克斯密特后期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苏萌(河南大学)辨析了作为史学实践的“叙事复兴”与理论问题的“叙事转向”间的关系与异同,两派对于诸如线性和非线性形式的不同观点显示了两派并非处于因果关系之中,而是处于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场域之内。顾晓伟(中山大学)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评价了佐藤正幸名作《历史认识的时空》,认为其对东西方规范型史学和认知型史学的区分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借鉴价值,综合以上两种史学传统的 Historiology 应是未来史学发展的方向。

除了上述集中于20世纪外国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之外,外国史学的多样化实践也给学者们提供了众多可供挖掘的主题,从关注非西方的史学写作到各类新题材的发现不一而足。唐薇(北京大学)梳理了20世纪至今苏联到俄罗斯的史学发展历程,认为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解冻”、80年代末的“历史热”都是推动史学研究和历史认识论革新的重要契机。黄畅(历史理论研究所)介绍了作为非洲史学重要分支的约鲁巴兰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当地史学家通过历史意识的唤醒,打破欧洲中心论及建立民族意识主体性的实践,对于当下多元化世界格局和话语体系的建立具有极强的参考

价值。王超群(山东大学)探讨了西方微观史学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分析了微观史学本身具有的多重意涵和受到的误解与质疑,并试图从底层个体的角度,尝试解决它与宏观史学对立的矛盾问题。张涛(四川大学)以《马丁·盖尔的归来》中贝特朗的形塑为例,详细说明了微观史学理论与实证研究嫁接的过程,从而揭示微观史学的应用界限。花卉史和大西洋史作为新颖的题材,成为会场讨论的亮点。陈建(临沂大学)回顾了杰克·古迪的花卉史研究历程,充分展现了物质文化研究中多元丰富的特性,进而解释了花卉文化发展中“功利主义”和“美学追求”的张力。魏涛(世界历史研究所)探讨了大西洋史的发展前景,阐明了大西洋作为新的历史研究单位和突破民族国家研究的新兴视角在二战后史学框架创新中的地位,为新时代全球史书写提供了对照系。总之,外国史学理论的发展不仅与外国史学实践的进程息息相关,其对于同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

五、中外史学交流

本届研讨会一大重要议题是“中外史学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借鉴,一直以来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中的宝贵经验和应取态度。同样,中外史学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既各自砥砺前行,又相互切磋琢磨,进一步深化了中外史学交流与比较研究应是新时代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目标。

李渊和邓锐两位学者的讨论均围绕中西文化母体时期——先秦与古希腊的史学思想的比较而展开。李渊(北京师范大学)从纳贡和贸易的角度出发,一改以往从政治制度的异同切入先秦诸侯国与古希腊城邦的比较研究,试图考察二者在经济方面差异对政治与“统一”的影响。邓锐(陕西师范大学)选取了老子和阿那克西曼德作为中西史学生成的哲学背景的代表,比较了中西史学发生的根基异同。共同的逻辑理路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两者的自然本原论产生了重大差别,深刻影响了各自文明的思想走向。此外,无论华夷之间抑或自西徂东史学思想的扩散与渗透,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主题。宗亮(湖北大学)讨论了清修《明史》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指出越南君主和士人嗜读《明史》,并将其作为资政和纂修本国史籍的参考,从而使传统中国史学深刻影响了东亚周边国家的史学发展。周厚琴(陕西师范大学)以雅尊斯基为个案,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学家雅尊斯基的学说传入新中国的过程,认为其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和“四分法”已成为苏联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标杆。陈安民(西南大学)从“中国眼光”解读西方史学批评,厘清了其中的主要原则、方法和目标,认为西方史学批评的经验可以为中国史学批评提供参照,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构架起全新的中外史学交流管道。

概观本届史学理论研讨会,我们可以发现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些显著趋势,如对理论探索的深入、对个案比较的重视等。借由这些新问题、新方法、新观念的提出和反思,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中国史学理论建设迈向一个全新高度。

(作者张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邮编:610065)

(责任编辑:张旭鹏)

(责任校对:李桂芝)